

屠格涅夫
文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屠格涅夫文集

第一卷

猎人笔记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二〇〇一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屠格涅夫文集(1—6卷)/(俄国)屠格涅夫著;丰子恺等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11

ISBN 7-02-003285-0

I.屠… II.①屠…②丰… III.①屠格涅夫—文集②文学—作品综合集—俄罗斯—近代 IV.I512.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1391 号

责任编辑:张福生 装帧设计:柳成荫

责任校对:郑南勋 责任印制:李博

屠格涅夫文集

Tugeniefu Wenji

[俄国]屠格涅夫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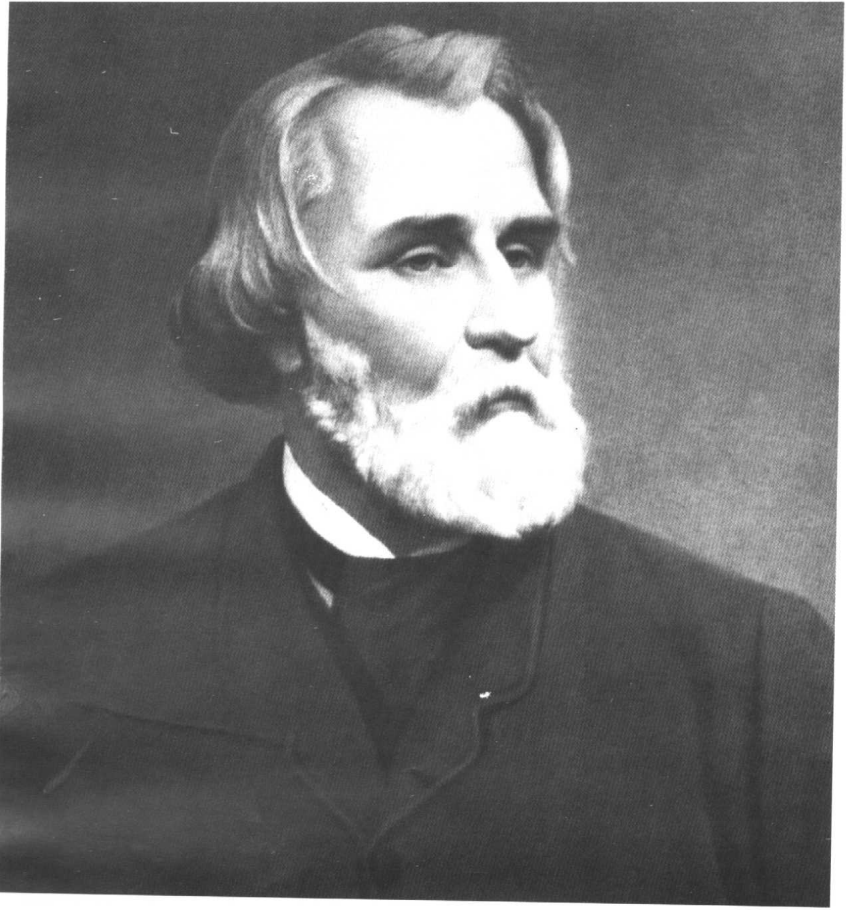
字数 1914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4 插页 39

2001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7-02-003285-0/C·23

定价:198.00 元



作者像

总 序

这套屠格涅夫文集共六卷，分别收辑作者的主要特写、小说、散文诗、文论和回忆录。他五十载笔耕的结晶，基本上都在这里了。

屠格涅夫开笔甚早，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念大学的时候起，便断断续续写作诗歌、小说、戏剧和评论，又凭借其外语优势，译出《奥赛罗》、《李尔王》、《曼弗雷德》等西方名著。但直到一八四七年《猎人笔记》中的《霍里和卡利内奇》诸篇面世，他才开始蜚声文坛。

《猎人笔记》总共包括二十五篇特写，大都作于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全书以俄罗斯中部的山川风物为背景，通过作者游猎期间的见闻感悟，参照他那暴戾的母亲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广泛描绘了农奴和地主的群像与生活。俄国农奴制产生于十五世纪末叶，到十八世纪下半期还处于鼎盛阶段，其后虽趋于败落，却仍然同专制政体沆瀣一气，成为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这个制度下的农民，其地位和境况类似当时的美国黑奴，因此别林斯基称之为“白皮肤的黑人”（《给果戈理的信》）。《猎人笔记》中的《叶尔莫莱和磨坊主妇》、《莓泉》、《利哥夫》、《总管》、《孤狼》等篇，就是这方面的真实写照。然而作者却从农民的卑微的外表下，敏锐地发现了淳朴善良、聪明机智、巨大的潜力和细腻的感情，他们应该堂堂正正地享有人的尊严和权利。《霍里和卡利内奇》、《歌手》和《活尸》都塑造了这样的生动形象。农家小孩

更是招人疼爱。《白净草原》描写他们在夏夜的田野上放牧马群时围着篝火,用各具特色的语言,讲述家神、人鱼、林妖、水怪、神通广大的“特里什卡”以及其他的民间传说,充分显示了他们丰富的想象力和表达力。同时,这些孩子,特别是帕夫卢沙,不仅善于谈神说怪,而且机灵勇敢,具有一定的生活知识,能够处理实际事务。可是他们的才具得不到正常的培养和发展,以至逐渐萎缩,甚而被摧残和埋没了。

总的来说,屠格涅夫表现农民对压迫者的不满和抗争时比较含蓄,不写暴烈的行动,不用慷慨激昂或尖酸辛辣的词句,这不仅出于书刊审查上的顾虑,也符合作者的气质和风格。但这种笔法并未削弱作品对农奴制和统治者的震撼力。一八五二年官府借口他发表一篇悼念果戈理的文章,将他放逐一年半之久,正是这震撼力的反证。

长篇小说历来是俄国文学家族的骄子。屠格涅夫继《猎人笔记》之后,也在这个领域大显身手,于一八五六至一八七七年依次推出《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烟》和《处女地》。在这六部有连续性的小说里,他像编年史家一样,忠实地记述了将近半个世纪内俄国社会的思想探索的历程、相继更迭的人物和事件:三四十年代的理想主义者,贵族对解放运动的领导权的结束,平民知识分子的崛起和壮大,七十年代民粹派“到民间去”的浪潮。这几部作品都提出了当时的迫切问题,在评论界和读者中引发过热烈的讨论与争辩。

《罗亭》脱稿于一八五五年,次年年初由《现代人》杂志发表。主人公罗亭是三四十年代俄国贵族知识分子中“多余的人”之一,早年曾积极参加莫斯科大学生自学小组的活动,潜心黑格尔哲学,继而负笈德国深造,立志要干一番事业。回国后他一度出任公职,但在本书里露面时已经引退,进入中年了。

罗亭能言善辩，他一来到贵妇拉松斯卡娅家，立刻凭着有力的论据、精妙的辞藻、生动的形象和比喻、对科学和真理的坚定信念，时而概括，时而引申，毫不费力便征服了所有的听众，包括主人的女儿娜塔利娅。过了不久，他郑重地向娜塔利娅表白了爱慕之意，并且获得深情的回应，可是遭到她母亲的严厉拒绝。他不仅无条件地表示退缩和屈服，甚至谄过于她：“胆怯的是您，不是我！”娜塔利娅这才知道，“语言的巨人”竟然如此不堪一击！多年以后罗亭回顾他一生走过的道路时，也承认自己柔弱寡断，言行脱节：“空话，全是空话！没有行动！”通过爱情来显示这种阴盛阳衰的性格反差，构成了屠格涅夫许多小说的共同特色。不过，罗亭主要是个宣传家，对于宣传家，语言就是行动。罗亭的严厉批评者列日涅夫也认定：“说一句好的话——这也算行动啊。”把理想和信念带给青年，成为罗亭的启蒙活动的重要内容。

其实罗亭并未满足于坐而论道。他曾经风尘仆仆地四处奔波，改良农田，疏浚河道，革新教育，但尼古拉一世时代那个窒息人才的社会环境不容许他发挥所长，“我刚得到一个固定的位置，刚有个落脚点，命运马上就跑来把我推开……”他落得一事无成，最后才算有机会献身于一八四八年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为坎坷的一生划上了差强人意的句号。

《罗亭》在艺术上可以作为屠格涅夫长篇小说的范例：主题单纯，人物不多，结构紧凑，情节不蔓不枝，既没有连篇累牍的议论，心理描写也简明扼要，一切都显得朴素自然而又令人久久不能忘怀。

《罗亭》问世不久，屠格涅夫开始构思《贵族之家》。书稿于一八五八年杀青，次年初仍由《现代人》刊出。在他的六大小说中，本篇引发争议最少，受到赞扬最多，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得力于它那哀婉动人的情节：拉夫列茨基夫妇携幼女出国，寄寓巴

黎。他在大学进修，妻子瓦尔瓦拉则热中交际，恣情风月，移居巴登—巴登后更是闹得沸沸扬扬。拉夫列茨基不得不同她分手，只身回国，打算专心重振家业。这时传来妻子亡故的消息，他信以为真，决计向一位远亲丽莎求婚。不料瓦尔瓦拉母女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他只好舍弃刚刚获得的幸福，勉强恢复有名无实的夫妻关系。丽莎无奈，悄然进了修道院。

《贵族之家》的故事发生于一八四二至一八五〇年，在时间上同《罗亭》的情节相近，主题仍是进步的贵族知识分子的命运。当时，三十年代莫斯科大学生的小组活动早就结束，原先稚嫩的理想主义者已变为成人，由于对祖国前途的评估不同，他们分成互相对立的两派，即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西欧派，和强调俄国的特殊性、赞赏彼得大帝以前的农业社会的斯拉夫派。拉夫列茨基倾向斯拉夫主义，归国时希望下乡务农。他愿意接近人民，承认人民当中有真理，并同丽莎家的朋友、迷信西欧的俗吏潘辛多次展开争辩，将对手的论点一一攻破。但拉夫列茨基所隶属的贵族阶级正处于没落阶段，他想有所作为，却难以克服冷漠懒散的旧作风，更无力反对丽莎的宗教信仰和社会上的陈规惯例，化解不了爱情的要求同作为丈夫和父亲的道德义务之间的冲突。他终于也像丽莎一样陷入宿命论，自认不配享受幸福。直到几年之后，他才真正振作起来，学会经营田地。不过毕竟青春已逝，来日无多，只能为朝气蓬勃的年轻一代祝福了。

丽莎为人严肃稳重，性格内向，同瓦尔瓦拉适成对照。她才智平平，却有自己的见地，同情拉夫列茨基对潘辛的批驳。她从小虔心奉教，相信爱一个已婚男子是罪孽，瓦尔瓦拉的归来就是上帝对她的惩罚，必须通过祈祷求得赦免。归根结底，幸福并非由人，而是由上帝主宰的。虽则她对尘世不无留恋，仍决定前往一个最偏远的地方与圣像青灯为伴，消磨余生。

一八五九年,屠格涅夫在《贵族之家》以后,创作了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前夜》,次年初交保守政论家卡特科夫所编刊物《俄国导报》分两期连载。

在《贵族之家》的“尾声”中,拉夫列茨基感到自己及其同辈的时代已成过去,因而语重心长地寄希望于下一代。但屠格涅夫很快就看出,要推进社会事业,“必须有一批自觉的英雄人物”(致伊·阿克萨科夫信),于是他把目光从贵族阶级转向新兴的平民知识分子,即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发展对人才的广泛需求,由僧侣、商人、小市民和小官吏等家庭出身的大批脑力劳动者。《前夜》和后继的《父与子》中都写了这种“新人”。

《前夜》男主人公英沙罗夫是莫斯科一名大学生,来自土耳其人霸占下的保加利亚。他的父母遭侵略者杀害,他为了洗雪国耻家仇,投身解放事业,被判极刑,负伤逃往莫斯科就读。一八五三年,俄国政府以保护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内部的东正教徒为由,对土开战。英沙罗夫和他的战友企图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回国举事,不料他在新婚的俄罗斯妻子叶连娜陪同下路过威尼斯时因病夭折,未能如愿。英沙罗夫明显高于罗亭和拉夫列茨基。他不尚空谈,而又胸怀大志,讲求实际,却并不褊狭;穷得几乎像乞丐,可是内心充实丰富。他只有一个目标:为苦难中的祖国效力。他虽然属保加利亚籍,其实体现了俄国民主主义平民知识分子的许多本质特点。

屠格涅夫清楚地意识到“新人”平民知识分子必将取代贵族,但他反对他们激进的政治、哲学和审美观点,只赞成自上而下的渐进改良。因此他讳言当时国内社会革命形势,却瞩目于域外的民族解放斗争,强调举国一致抵御外侮,而淡化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其关键便在作者同“新人”的思想分歧。当杜勃罗留波夫在《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一文中呼唤“俄国的英沙罗夫”,

希望他们奋起抗击“国内的土耳其人”即专制农奴制的维护者时，立刻激怒了屠格涅夫。^① 即使就民族解放斗争来说，作者也没有叙述英沙罗夫的具体活动，因为这对于他是一个过于陌生也过于困难的课题。他让主人公未及出师便赍志而殁，这当然有损于其形象的生动性。

相比之下，女主人公叶连娜的面貌倒是显得鲜明些。她对积极行动的憧憬和对贵族家庭的背叛使她不仅同丽莎迥然异趣，也决非那位可以傲视罗亭、最后却甘心下嫁一个碌碌无为的绅士的娜塔利娅所能望其项背。叶连娜在英沙罗夫卧病威尼斯时固然有些宿命的想法，但她遭到丧夫的沉重打击之后仍旧坚强地忠于他的遗志，决心以护士身份参加保加利亚民族解放战争，成为俄罗斯文学中最可敬的女性人物之一。

《前夜》面世前后，要求农奴制改革的呼声愈来愈高，民主主义平民知识分子同自由主义贵族在改革的方法和道路问题上的分歧也愈来愈尖锐，而作为双方论争和社会关注的焦点的农民，在一八六一年改革中受骗后，更接二连三地掀起了暴动的浪潮。正是在这种爆炸性的局势下，屠格涅夫于一八六〇至一八六二年间创作了他的影响最大的长篇小说《父与子》，仍交《俄国导报》刊行。

作品名叫《父与子》，着重描叙的却不是父子之间，而是自由派贵族帕维尔·基尔萨诺夫同家道小康的医科大学生巴扎罗夫之间的冲突。帕维尔在辩论时抵挡不住巴扎罗夫的凌厉攻势，被迫节节败退；后来又在同巴扎罗夫决斗中出乖露丑，自取其辱。正如一八六二年屠格涅夫给赫尔岑的一封信上所说，“这是

① 这件事成了屠格涅夫同《现代人》决裂的导火线，也是他不在该刊发表《前夜》，而将原稿转给卡特科夫的《俄国导报》的真正原因。

民主对贵族的胜利”。但帕维尔们并非等闲之辈，他们是“贵族中优秀的代表人物”（同年致斯卢切夫斯基信）。帕维尔的失败不能全由他本人负责，根源在于他所隶属的阶级大势已去，非个别佼佼者所能挽回。屠格涅夫意在证明：佼佼者尚且如此，其他贵族更不在话下。因此，致斯氏信又宣称：“我这整个小说都是针对作为先进阶级的贵族的。”

巴扎罗夫正直刚毅，崇尚理性，重视实践和科学试验。他一出场便显得气概非凡，其余的人顷刻之间都被他压倒。他使用的武器是否定，他断言“目前最有用的事就是否定”——否定贵族制度、自由派及其口头禅“进步”，也否定各种被奉为金科玉律的“原则”，甚至要“否定一切”，“破坏一切”，“先把地面打扫干净”，好让别人来建设。

“否定一切”的豪言壮语说明了巴扎罗夫的气魄，同时也暴露了他的偏见，因为这“一切”包括着爱情、艺术、大自然之美和其他不该否定而应加以珍视的东西，这也是巴扎罗夫区别于被屠格涅夫称为“真正的否定者”的别林斯基、赫尔岑和杜勃罗留波夫（上引致斯氏信）的论点之一。

还有更重大的区别。

前文说过，六十年代俄国社会的焦点是农民问题，当时平民知识分子的活动基本上以此为中心，而巴扎罗夫对农民却非常隔膜：“俄国农民是个神秘的陌生人……谁能够了解他！他连他自己都不了解。”更有甚者，这个亲眼见过百姓疾苦的巴扎罗夫谈起改善农民生活时，竟冷言冷语说：“我应当为他出力，他对我连谢也不谢一声，等到农民能住上整洁的房子的的时候，我巴扎罗夫早已埋骨荒冢了。”这些令人失望的话完全背离了六十年代民主主义者的根本信念。

但在屠格涅夫心目中，巴扎罗夫“确实是我们时代的英雄”

(一八六一年致卡特科夫信),甚至是“革命者”,而同时,他却被塑造造成“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在解剖农民的遗体时感染伤寒病而过早逝世,作者强调说,巴扎罗夫之死并非出于偶然,他是“注定要毁灭的”(均见上引致斯氏信)。这个结论只是屠格涅夫对当时整个大局的评估的一部分,他在上引给卡特科夫的信中说:“我对俄国的看法要比您设想的更为悲观。”

《父与子》发表后在评论界和读者群中激起轩然大波。卡特科夫等人责备屠格涅夫对巴扎罗夫顶礼膜拜,反之,安东诺维奇代表的《现代人》编辑部却认为这个形象是对年轻一代的诽谤和讽刺;评论家皮萨列夫则比较公允地肯定了巴扎罗夫典型的积极意义。下面谈及屠格涅夫的回忆录时,我们还要回到这个题目上来。

屠格涅夫第五部长篇小说《烟》(1867),叙述主人公李特维诺夫在社交界一个贵妇人的吸引下,背弃自己的未婚妻,最后憬然回头的故事。但这只是个框架,作品的主旨要严肃而复杂得多。

屠格涅夫写《烟》的时候,他原先寄托很大希望的一八六一年改革的虚伪性已逐渐显露,而赫尔岑和奥加辽夫当作俄国发展道路提出来的民粹主义又遭到他的坚决排斥。他创作时一如既往,对这类重大社会现象没有漠然视之。可是这一次他把舞台移到德国,并改用了谢德林式的讽刺笔法,一方面着重揭露聚集在那里的俄国将军和贵族的腐朽凶残,以及妄图恢复被废除的农奴制的疯狂叫嚣;另一方面也没有放过俄国的革命侨民,特别是其中的古巴廖夫,作者不但抨击他们的政见,并且怀疑他们的道德品质,因此引起许多进步人士的严厉批评。作为上述两个集团的对立面而出场的,是西欧主义者波图金和自由派渐进论者李特维诺夫。波图金表达了屠格涅夫本人对农民村社和民

粹派空想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但他那些近乎民族虚无主义的过激言论则只是西欧派极端分子的偏见。李特维诺夫经历了一些沧桑变故之后,“觉得一切都是烟,……无论是他个人的生活,还是俄国的生活”,都像烟一样飘忽不定,随风流散,到头来只落得一场空。好在他还没有完全消沉,终于从国外回到自己的庄园,取得温厚的未婚妻的宽恕,一道经营农场和工厂,外加兴学行医。虽无多大建树,毕竟将书中的悲观气氛冲淡了一点。

《烟》问世后,屠格涅夫经过长期酝酿,于一八七六年完成了他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处女地》,全书的核心是写一批青年投身民粹派“到民间去”运动的曲折历程。由于对俄国现状和前途的看法不同,这批青年分成了渐进和激进两派。渐进派的代表索洛明,为人稳健质朴,处事踏实冷静,主张自下而上地逐步改革。他经营工厂,办学校,建医院,继承了李特维诺夫的衣钵。屠格涅夫认为这是当时俄国最需要的人物,卷首题词所说的“铁犁”,就是指索洛明那种启蒙式的方法,而不是指革命。与此相反,索洛明原先的伙伴涅日丹诺夫、马尔克洛夫等却强调发动农民群众起来反对专制制度,进而在村社的基础上向社会主义过渡。但事与愿违,结果一败涂地。作者肯定他们的革命热情和献身精神,对他们的斗争方式则加以无情的嘲讽,以致民粹派骨干洛帕京、米海洛夫斯基以及同情民粹派的谢德林、涅克拉索夫等纷纷表示强烈不满。在各方的夹击下,屠格涅夫于一八七七年三月写信给哥哥尼古拉说:“毫无疑问,《处女地》是失败了,……应该承认我错了:我做了一件力不胜任的工作。”

更值得重视的是一九〇一年克鲁泡特金在《俄国文学的理想与现实》一书中对《处女地》的评语,因为他亲自“到民间去”过,熟悉情况,加之他写书时离运动已将近三十年,时间消除了不少误解和疑团,立论较为客观。克鲁泡特金断定,屠格涅夫

“完全同情”这场运动，尽管他没有身临其境，然而书中的“许多篇章是真实的”，他凭着敏锐的直觉掌握了“到民间去”初期的两大特点：其一是那些倡导人不了解农民，其二是他们具有“哈姆雷特式的性格，缺乏决断力，或者不如说决断力被病态的思想情绪削弱了”。

除了上述几部反映重大社会问题的长篇小说，屠格涅夫还写过很多以贵族为主体的、缠绵悱恻的抒情性中短篇。我们这里只选收了其中的《木木》、《阿霞》、《初恋》、《草原上的李尔王》、《春潮》及《普宁与巴布林》。

《木木》(1854)是屠格涅夫早期的名篇，在主题上接近《猎人笔记》，借用真人真事而有所增删。老寡妇影射作者的母亲，格拉西姆是她的聋哑家奴。此人身材魁梧，体力超凡，但在老寡妇的淫威之下，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他所倾慕的洗衣女工被迫嫁给一个酒鬼，他自己又不得不狠心淹死相依为命的爱犬木木。他忍无可忍，终于下定决心，卷起铺盖离开了残暴的主人。格拉西姆的强壮、膂力、出走、由屈辱到愤恨和无言的抗争，都具有引人深思的象征意义，因而受到审查机关的压制，脱稿后两年才交《现代人》刊发。

《阿霞》叙述一个富家奴婢的私生女阿霞的感情波折。尴尬的处境造成她怪僻的性格、扭曲的心态，也加强了她对爱和被爱的盼望。她甘愿委身相从的贵族青年H虽对她有意，但想到她的身世和教养，便像罗亭一样临阵退缩。阿霞绝望之余，悄然离去。这篇小说于一八五八年由《现代人》第一期发表，受到大部分读者欢迎。车尔尼雪夫斯基写了一篇不同寻常的读后感《幽会中的俄国人》，结合当时的局势，有力地谴责了H一类优柔寡断、怯懦无能的自由主义贵族，并呼唤新的人物形象，为平民知识分子再造声势。

《初恋》(1860)是作者人生阅历中的一支插曲,写一个介乎稚嫩与成熟之间的十六岁少年心中情爱的觉醒,以及这觉醒给他带来的快乐和迷醉。当他发现他的竞争对手就是他崇敬的父亲时,原先的幸福感立刻变成了惊讶、窘感和惶悚。篇末又出现了读者所熟悉的屠格涅夫式的慨叹:青春易逝,人事倥傯,最后无非是黄土一抔,了此一生。

有些论者指责《初恋》的内容不道德,当时的评论家阿·格里戈里耶夫在《艺术与道德》一文中坚决予以反驳,宣称这篇小说里“没有任何暴露性的或教诲性的东西,有的只是激情、温馨和诗意”。赫尔岑、托尔斯泰等也同声赞赏。屠格涅夫夫人屡次表示他对《初恋》特别珍惜,曾反复阅读回味,谢世前不久,他说过:“这是我自己至今还满意的一篇作品,因为这是生活本身,并非向壁虚构。”

《春潮》(1872)与《阿霞》、《初恋》同属屠格涅夫笔下的著名爱情故事。这篇故事的三个主角,都是他原先所写同类人物的延续和深化。萨宁可算作者历年塑造的一系列“多余的人”中的最后一个,不过他晚期的种种行径,却使他从他的前辈罗亭和拉夫列茨基后退了一大步。萨宁为之一人迷的玛丽亚·波洛佐娃,则是屠格涅夫刻画最后一个任性、风骚、泼辣的交际花形象;瓦尔瓦拉(《贵族之家》)和伊琳娜(《烟》)的性格特征,都集中到了她的身上。萨宁原来的恋人杰玛,大体上同娜塔利娅(《罗亭》)、丽莎(《贵族之家》)等属于一个类型,她们单纯朴实,渴望从自己敬佩的男子那里获得真挚的爱情,但最后都遭到了不幸。

《草原上的李尔王》的内容有点像莎士比亚的《李尔王》,描写男主角的两个女儿获取他所赏赐的财产以后,非但不感恩图报,反而对他百般虐待,逼得他神经失常,在满腔悲愤中离开人世。在情节和意蕴上,本篇比那个哲理性的莎剧简单得多。

阴暗的农奴制背景,将作品的俄罗斯特色衬托得更加鲜明了。

比照屠格涅夫六七十年代那一批基调低沉的中短篇小说,他的《普宁与巴布林》(1874)格外显眼,这主要由于它写了一个愤世嫉俗的民主主义者巴布林。

巴布林出身小市民,粗通文墨,先在地主家当差,后来入工商界供职。他不畏强暴,当面指责女东家随意流放农奴是“滥用地主的权力”;他痛恨老板残忍贪婪,而且敢于袒护工人。因此他多次失业,四处漂泊,但他无悔无憾,仍然忠于自己的信仰。一八四九年,进步知识分子集团彼得拉舍夫斯基派遭难,巴布林也被捕入狱,发配西伯利亚。遇赦后他自愿留在原地,同禀性刚直的妻子一起兴办学校,从事社会活动。一八六一年得到解放农奴的文告时,他欢呼“乌拉!乌拉!上帝保佑沙皇!”并邀集亲友,为沙皇的健康干杯……这个结尾显然表达了作者本人的政治观点,曾受到谢德林的嘲笑。

一八七八至一八八二年,屠格涅夫陆续写了八十二篇散文诗,但只有五十篇以《老年人的话》为总标题在他生前发表过。我们这里从八十二篇中选收了五十二篇。

散文诗这一体裁兼备着散文和诗的基本特点。它像散文一样自由,不受格律的约束,不分行分节,同时又具有诗的精练、意境和韵味。它可以抒情、叙事、状物、写景、说理、咏怀,可以白描和彩绘,或者将各种写法穿插融会,合为一体。有时是作者随手拈来,自然浑成,有时则经过长期的思考,才从中提炼出短短几句哲理性的格言。

屠格涅夫是在一种特殊的境况中写作散文诗的,他已走过六十来年的人生路程,体弱多病,长期鰥居异国,尽管好友波莉娜·维亚尔多夫人对他依然倾心相与,可她毕竟是有夫之妇,难

以化解他的孤寂和悲愁。他那些以丧家之犬自况的告白，读来令人心酸。他在法国惟一的亲眷——他的非婚生女儿，偏偏又遇人不淑，陪嫁被挥霍殆尽，她只好带着几个孩子外出避祸。这场婚变，对她的老父更是一个无法承受的挫折。

那个时期屠格涅夫的经历和感受，不能不给他的散文诗投下浓重的暗影。作为自我写照，诗中的老人伶仃孤苦，在家由爱犬作陪，出门与小猴结伴。他偶尔信笔涂抹几句，只是消闲解闷，聊以自娱。有时追忆逝水年华，让旧日的生活再放光辉，然而今昔间的强烈反差，适足以使他产生白云苍狗的哀叹。残余的生命在不断地流逝，心脏眼看就要停止跳动。他觉得有个丑陋的老婆子紧跟在他背后，用凶恶的眼光盯着他，向他狞笑，把他赶往黑洞洞的坟墓。不过他面对死神时并未愤愤不平，也无心去设想来世的情景。描写大自然的冷漠严酷和世界末日的恐怖景象，同样是当年屠格涅夫情绪的一种流露。

可是他没有忘记在散文诗中歌咏爱——友爱、母爱、对祖国的热爱、对仁人志士的敬爱、对不幸者和卑贱者的怜爱；当然，还有他所珍视的情爱。他也留下了少许色调明朗的篇章，又花费了一点笔墨来针砭时弊，包括某些文坛恶习在内。

总之，这部散文诗的内容是庞杂的、互相矛盾的。屠格涅夫晚年的思想感情，大都被浓缩到这些微型作品里来了。

作者在致福楼拜的一封信上说过：“在我们今天，没有一个艺术家不是同时兼做评论家的。”这话当然也适用于他自己。屠格涅夫的评论涉及绘画、雕塑、音乐和演剧，重点仍在文学。

他谈《浮士德》的文章属早期论著（1845），颇有些独特的见解。他肯定《浮士德》是一部伟大的杰作，其中充分展现了欧洲中世纪和近代十八世纪之间那一历史阶段。浮士德是中世纪的